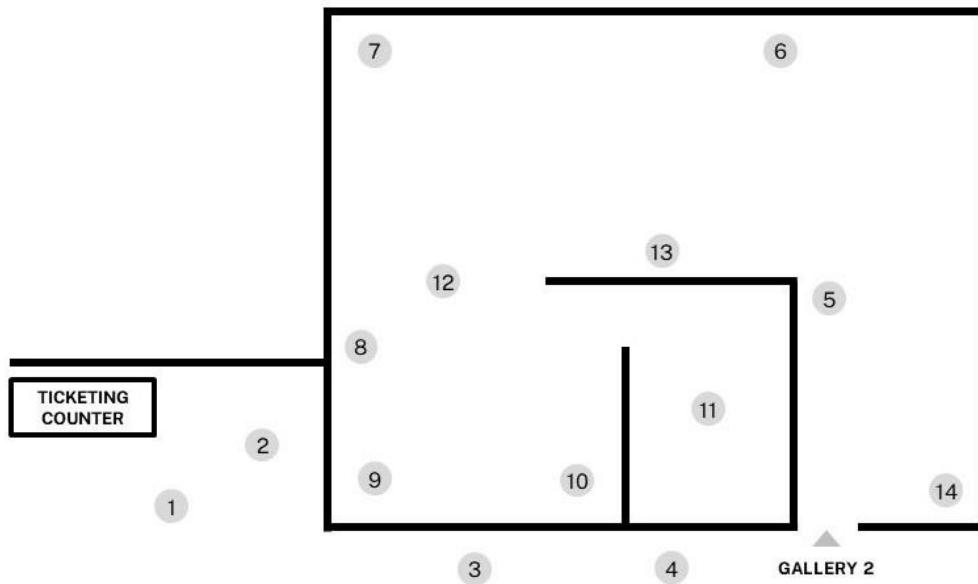




新的科技发展带来有关“化身”(embodiment)的新观念，大家对人类现实的了解也因而产生改变。贯穿展览《大家都能看到我的屏幕吗？》(Can Everybody See My Screen?)的几个主要概念有：人是如何与科技交流以及接合的；人在数码空间中如何让“真实”与“虚拟”之间取得协调；以及上述关系是如何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及与他人甚至自我连接的方式。

展览探讨了艺术实践与日益数码化的现今世界如何进行接合一从感官和身体的科技调解(technological mediation)以致社会批判，还有数码空间如何带来有关自我认同、亲属关系和爱的各种可能性。“屏幕”是这次展览的主轴，所以展示品均以它为核心，物质借由这个平面被“非物质化”(dematerialised)；换句话说，它是一种实物，好比处于现实自我和虚拟自我之间的界线。令人感到讽刺的是，通过屏幕这道门户，我们的现实生活经动画创建、重新建构、重新想象而获得永生、得以复活。展览作品探索的是屏幕的空间；原子和像素之间，建立起来的种种关系。

《大家都能看到我的屏幕吗？》捕捉了人们采用科技并以屏幕为界面兼调解核心(locus of mediation)的矛盾心理。展览名称源自人们长期进行远距离互动时，最常使用的话语之一。参展作品选自新加坡美术馆馆藏，同时包括新的委托作品。展览除了聚焦于新近的探索项目之外，也介绍创作于2000年代的一些早期作品。



1, 7, 14.

赵悦翰

(1987年出生于新加坡)

《追踪：进入接触中心》《Trace2: Entry Contact Hub》

《追踪：媒介接触中心》《Trace2: intermediary Contact Hub》

《追踪：离开接触中心》《Trace2: Exit Contact Hub》

2022年

混合媒体装置

尺寸可变

新加坡美术馆委托作品

《追踪》(《Trace2》)探讨“合力追踪”(TraceTogether)便携器挥之不去的影子，以及地理围栏(geofencing)、生物监控(bio-surveillance)和那些应运而生的新生活方式，尤其是在新加坡逐渐停止使用密切接触者追踪系统之后的若干新形态。艺术家与一名舞蹈家和作家合作，推出了这件充满假象意味的装置作品。作品采用了由动作传感器启动的追踪系统，对疫情带来的创伤后遗症、复原情况和对实体和数码空间的新认识进行探索。《追踪》(《Trace2》)是《智慧国表演》(Performing the Smart Nation)的续篇。《智慧国表演》是赵悦翰尚未完成的作品集，它试图在编舞的范畴中找出新的表演策略，以便彰显智慧国的集

体愿景。《便携器踪迹》则把整个展览空间改造成传送和合作的趣味场地，重新想象了社会的具体体验和被规范的习惯（conditioned habits）。

合作者：

密切接触者追踪实体：Bernice Lee

视觉效果：formAxioms

人工智能文字作者：费德里科·鲁贝托（Federico Ruberto）

2.

泰拉·峇哲拉郭莎（Terra Bajraghosa）

（198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

《那喀索斯像素岛》《Narcissus Pixelus》

2009年

互动电脑游戏

210 x 70 x 70 厘米

新加坡美术馆馆藏

《那喀索斯像素岛》的创作灵感主要来自街机游戏机的视觉形象。电玩游戏厅曾经风靡全球各地，直至千禧年到来之际，受欢迎度才有所下滑。它象征着某个年代的青少年文化和社会空间。在那个社会空间当中，玩电动游戏取得优异表现，成了一种自我肯定以及取得同辈认可的方式。《那喀索斯像素岛》是个不靠技术或运气取胜的游戏。参与游戏的玩家必须使用艺术家创建的像素格式或模板小样创造出理想化的数码自我（digital self）。艺术家的像素与实际像素有所不同，后者指的是对某个数码影像进行的中立抽样，而前者则采用预先设定的视觉图案设计而成，这些视觉图案代表肢体或配饰等物件。虽说这些自拍照看似独特，然而仔细观察，便能发现它们均被固定的几种设计样板所限制。就如标题所示，痴迷于自拍就等于沉迷在数码世界这个理想空间之中，在那里，自由选择被误解成拥有自主权。

3.

张锦超 (Chong Kim Chiew)
(1975 年出生于马来西亚)
《无法读的墙壁》 《Unreadable Wall》
2013 年
报纸纸浆制成的砖块
尺寸可变
新加坡美术馆馆藏

《无法读的墙壁》是件装置作品，由数百件特制砖块堆砌而成，制作材料取自切碎并打成纸浆的马来西亚报纸。就如标题所示，这种形制的报纸根本是无法阅读的，更毫无作用可言。作品的摆放位置正好在展示厅入口处，形成一道故意阻碍人们进入的屏障，也是一种象征手法，用来凸显艺术家祖国里有限的新闻自由。

若把此思考方向延伸至网上新闻平台和网络空间，作品则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符号，既代表信息自由流通的受阻现象，也象征了威胁全球互联网空间的种种压力，其中包括科技发展、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和商业惯常做法等。另一方面，置身这道墙前面所带来的实质体验，让我们意识到电子屏幕以外还有自身形体或肉体的存在。

4.

刘威延 (Urich Lau)
(1975 年出生于马来西亚)
《代码文件：三个穹顶》 《Code File: Three Domes》
2016 年
铝板数码打印
40.6 x 50.8 厘米（每张印刷图像）；10.2 x 10.2 厘米（每张代码印刷本）
新加坡美术馆馆藏

《代码文件：三个穹顶》呈现的三个圆屋顶，是新加坡三栋历史性建筑的鲜明标志，这些建筑如今是重大文化机构的所在地。然而作品中的三个穹顶在外观上有多处与原来的建筑圆顶相互

抵触，造成一种模棱两可的感觉。毛病被发现后，一丝丝不安接踵而来——就如快要失去信号的电视屏幕或暂时发生故障的电子仪器一般，这种不安在吸引观众目光之余也动摇了其对象的信心。

艺术家把国家艺术机构发表的各种充满理想的声明置入原始资料，以幽默手法打造出意想不到的影像，藉由对照片所属的电子代码文件的改动，对新加坡艺术生态的特性和所继承的历史进行反思。这些文字虽然代表了对本地艺术界的期许和冀望，它们对代码文件的干扰却导致影像被扭曲，原始照片的完整性也因此遭到破坏。刘威延大量采用干扰的美学理念，来质问权力的结构以及它们挥之不去的影响。

5.

刘威延 (Urich Lau)

(1975 年出生于马来西亚)

《生命电路》《Life Circuit》

2009 年至 2016 年

多媒体装置，附有显像管，头戴支架，改装器件（焊接护目镜，耳罩，防毒面具，液晶显示屏，监视摄像头，扬声器和扩音器）和铝板印刷品

尺寸可变

新加坡美术馆馆藏

在艺术家最初的构想中，《生命电路》主要采用一套可穿戴器材进行视频演示。这件器材以工业安全配备注成。经改装后的各种器件穿戴在身上，启动后即变成身体的延伸部分，身体这时虽然无法看、说和听，却能够发送捕捉自四周的音频和视频。作品在这里以多媒体装置的形式呈现观众眼前，让大家看到现场由监视摄像头捕捉到的自身影像。由于传送至单一器件的输入数据过于庞大，导致大家的影像出现颤抖和振动的现象。

新加坡是个科技先进的社会，潜伏其中的隐患却不少，如隐私、数据收集等问题，另外也出现“有了数码能力却少了一份人情味”的现象，这是《生命电路》所要折射出来的生活形态。器材原是为增强使用者能力而设的，然而经过艺术家改造和穿戴后，却对他的感官造成限制。透过监视摄像头看到的现场直播，在利用人们藉由自我形象肯定自己的行为倾向的同时，假借娱乐之名收集数据和侵犯个人隐私。

6.

KYTV 艺术团体

《博人气之权术站精选集》 《The P.O.P. Station Greatest Hits》

2004 年至 2009 年 / 2022 年

多媒体装置

尺寸可变

新加坡美术馆委托作品

KYTV 是英文 “Kill Your Television”（杀死你的电视机）的缩写。早在抖音出现之前就有了 KYTV 艺术团体的《博人气之权术站》（P.O.P. Station）。它最初于 2004 年至 2009 年期间以互动型作品的形式呈现，到场的观众会被邀请制作音乐视频，并担任片中主角。这些音乐视频结合了 KYTV 艺术团体创作的配乐和背景。作品针对音乐行业偏向使用公式化手法打造具商业价值明星的现象作出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应。KYTV 艺术团体在意识到流行文化将会去中心化之后，开始通过《博人气之权术站》为有抱负的表演者提供必要工具，并将他们创作的音乐视频上载到 YouTube 视频网站，希望这么做能够借助该平台的传播威力，让视频既能疯传开来又能名声大噪。

今年，《博人气之权术站》卷土重来，推出最新的版本《精选集》，藉由活泼生动的手法呈现多媒体演示，追溯了 KYTV 艺术团体的创作轨迹。视频墙上显示着靠个人奋斗成功的若干明星和一段反映《博人气之权术站》之演变的伪纪录片，既展现社交网站的早期形态，也对普通市民的角色和梦想以及互联网的共享人性给予认可。

8.

查蔡·裴皮亚 (Chatchai Puipia)

(1964 年出生于泰国)

《窗户（爱我…爱我不…爱我）》 《Windows (Love Me...Love Me Not...Love Me)》

1997 年

帆布油画

200 x 150 x 4 厘米

新加坡美术馆馆藏

在《窗户（爱我…爱我不…爱我）》这件作品中，艺术家被描绘成一丝不挂、男女不分的形象，他身穿充满异国风情的女性化衣饰，看起来既孤立无助又温和顺从。互联网在全球的兴起直接推动了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国际婚姻中介服务的发展。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诞生的上述作品，可被视为对邮购配偶和网络约会现象背后的权力分配不均问题作出了尖锐评论。艺术家以夸大的手法描绘人物，并将之置于状如浏览器窗口的框架之下，这种构图形式让人想起零售店的窗口；唯有撕破网上交际背后的迷乱假象，才能看清网络关系潜伏着的商品化意图。

9.

杨淑芬

(1978 年出生于新加坡)

《一件纪念品》《A Souvenir》

2022 年

夹娃娃机，附有全包覆式贴纸，胶囊和礼品，地面贴纸，视频和音频

182 x 80 x 80 厘米（夹娃娃机）；170 x 170 厘米（地面贴纸）

音频时长约 11 分钟

声景制作：Robin Chua (KiDG)

新加坡美术馆委托作品

“选择”与“机遇”是网上约会和恋爱关系成败的关键因素，也是杨淑芬在《一件纪念品》探讨的重点。就以网上约会而言，如何驾驭大量出现的“选择”和“机遇”的确是种挑战。机遇是一种承载着希望的情感体验，许多感到孤独郁闷的网民往往会借助约会软件寻找“命中注定的另一半”。网上约会软件的使用者以为一切均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殊不知许多机制环节实际上是由软件程序算法在操控。选择和机遇变成了一种赌运气的游戏，这也是艺术家以夹娃娃机作为隐喻所探索的机制。那些检视我们对社交软件和网络媒体的依赖的当代文化和摄影理论是杨淑芬关心的课题。艺术家藉由夹娃娃机的屏幕，展现对上述课题的关注，并引用了浪漫、诱惑和亲密行为在视觉和文字上的叙事典型。

10.

Xafier Yap

(1998 年出生于新加坡)

《第二个青春期》《2nd Puberty》

2022 年

游戏装置

尺寸可变

新加坡美术馆委托作品

《第二个青春期》是一项体验式作品，以平面电子游戏的形式出现，通过游戏这道门户，人们可以重新想象时间、空间和存在方式。作品的设置有如私人桌面游戏空间，观众可使用贴有图样的苹果笔记本电脑 MacBook Pro，从虚拟化身的视角探索虚拟世界、面对他人的判断，以及和自我进行对话。作品颠覆传统故事线和游戏机制，转而取材自在异性恋常态化社会中生活和经历变迁的体验。艺术家利用电子游戏有助建构虚拟世界和发现新事物的特点，打造出一个虚拟事物不被视为与“真实”对立而是“真实”之组成部分的空间，并在过程中向我们介绍了如何互相交流沟通，甚至理解他人和自己的新方式。

11.

曹斐（第二人生中的化身：中国·翠西）

(1978 年出生于中国)

《我·镜》《i.Mirror》

2007 年

引擎电影，单频录像，4:3，彩色，有声

28 分钟长

艺术家收藏

艺术家声明：

什么是虚拟，什么是真实，或许不再重要，它们已经边界模糊，在虚拟世界的我们，不是我们本身，恰恰又是我们，我们总是质疑虚拟空间对现实的侵蚀，但是否我们依然能够在虚拟社会

找到一种融合的可能，那是一种超越真实的力量，连接着真实的那端依然是人类对朴素的爱，对自由的追求，与其让“神爱世人”，不如让我们互相拯救吧。

12.

默罕默德·阿克巴 (Muhammad Akbar)

(1984 年出生于印尼万隆)

《Il Fait Bleu》

2014 年

单频录像投影

尺寸可变

新加坡美术馆馆藏

阿克巴在法国拉罗谢尔担任驻地艺术家时，对黄昏天际出现的湛蓝色调印象深刻。那种色调让他想起电脑蓝屏。蓝屏是创作各种特效的背景；电脑没有信号时也会出现蓝屏。这种“空无一物”和“被中断”的状态巧妙地暗喻了艺术家身处异地的体验。《Il Fait Bleu》捕捉了天空从日出至日落的变化。作品邀请沉浸在变幻蓝彩当中的观者试图在脱离/连接环境之际，进行一次冥想般的凝视体验。围绕天空的一些图案元素象征拉罗谢尔的历史和古典建筑物，营造出置身封闭式庭院的错觉，让站在那里的观者仿佛看到了一片天堂。

13.

徐家辉

(1979 年出生于新加坡)

《打造未来身体之计划书》《Prospectus for a Future Body》

2010 年至 2012 年

混合媒介视频装置

尺寸可变

新加坡美术馆馆藏

《打造未来身体之计划书》针对身体如何记得和建构科技叙事提供新视角。研究舞蹈当中的人体动作是此项目的核心：面对未来前景的各种可能性，它应该如何进行改变、作出适应或重新

调整？徐家辉在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求学期间，曾推出了几场行为艺术表演和演示活动，探讨科技在绘制、收存和转移各种动作的潜能。艺术家利用电脉冲把这些动作“记忆”传回人体，重新定义了编舞者、舞蹈家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作品质问我们是否能够为人体打造“未来的记忆”，以及是否能把人体当作过去和未来的各种动作的来源、存放处、载体和媒介。

徐家辉就科技影响力如何改造人体、时间和空间（尤其是互联网和数码/虚拟领域）的关系进行初步探索后创作了《打造未来身体之计划书》。他与科学家和工程师合作，在作品中检视在虚实之间的时空中所找到的情感触发点。